名家

刊头题字：鲍贤伦
期号：HMB2009010
主办：金谷满园广告公司
惠尔轮胎有限公司
本版电话：88501009

一种古意生处的持守

——论鲍贤伦书法实践的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查律

鲍贤伦，祖籍浙江鄞县，1955年出生于上海。1974年从徐伯清先生学习书法。1982年春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浙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

作品曾参加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展（1982年），第二届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1986年），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1998年），日本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2000年）等国际书法展览。

作品曾获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1981年），并多次入选全国书展、全国中青展。近年来先后在杭州、宁波等地举办个展。出版有《鲍贤伦隶书对联册》、《鲍贤伦书法集》等。

2008年被《中国书画》提名为“中国当下最具学术价值的十位书法家”之一，被上海《书法》杂志提名为2008年度人物。

鲍贤伦的书法无疑是独特的，他的个性是建立在对书法本体的独到领会和解读的基础上的。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述其书作的特征，“古”字足当之。从书体的角度来说，鲍贤伦以汉隶作基，曾在隶意浓重的北碑中吸取养料，而后上溯，由汉入秦，以篆意浓郁的古隶为乡，完成了他不同台阶的跨越。

对于汉隶的师法，清人走的是汉碑的路子。有所成就者首推郑簠，郑簠以汉碑立其体格，以行、草笔意掺之，劲拔中见秀丽。而后有金农出，为清代隶书大家，再者如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杨峴等皆以汉碑为本。清人隶书重在金石趣味的追求和呈现，他们所关心的是对于笔画线条厚重、迟涩基础上不同趣味的探索，以求其气度和情调。

■ c ¤ ل ¯ 026b l ¥12b l ¥1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考察中发掘出土竹、木简之后，遂成汉隶的另一师法类型。汉简为汉代日用文书记录，与碑的特定功用不同，大多活泼有致，其中又兼楷、草萌生形态，用笔爽健、劲利，结字多变，虽以扁形为主体但变化无定则。师法汉简有所成功者以来楚生、钱君匋为代表，来楚生兼工大篆，其用笔较钱君匋质厚、朴茂，钱君匋隶书行笔轻快、健利，时多有草意。

时下隶书创作基本上还是上述这两大类型。以篆入隶的创作探索比较少，较早的有陆维钊先生，其于金文、石鼓、汉碑、北碑均所用功，糅篆隶而创所谓“蜾扁”一体，自具特色。时下王镛先生也偶有以篆入隶的创作。王镛于北碑及汉砖文用功颇深，汉隶刻石也多用心，以这三者为基础掺之商周金文作书，别具意态。其所求也在金石之趣，行笔多苍茫、凝重又不乏率意，结体求开阔、疏朗。细观古来书迹流变，此两者皆可谓之别趣，自成其态而寡于相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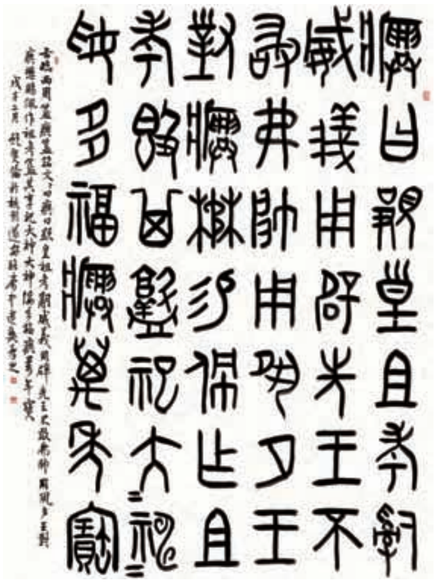
与上述清代以来隶书创作的总体状况相比较，鲍贤伦的隶书创作无疑具有独到的价值和意义。他在汉碑基础上更往前溯，进而追到秦，这一选择非同寻常。秦简牍是一个独特的文字书写系统，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首次出土秦简一千一百五十余枚，后又有青川秦牍、天水放马滩秦简、龙岗秦简、江陵扬家山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陆续出土。这些战国晚期至秦王朝的简牍属于古隶体系，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其文字的构件在篆与隶之间，部分是标准的篆体，有些则完全是隶书体了。同样作为书体演变的一个阶段，秦简与汉简中具有草、楷书倾向的书迹不同。汉简隶书向楷、草过渡的书体形态极不稳定，因为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发展，书写者有多种尝试的可能。相比之下由篆入隶的转变则平和、自然得多，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就存在了相对可以整体把握的古隶形态。这种相对稳定的古隶书体在古代书写者的使用中会对其字形及其构件作一定的形态整理，使其既适应便捷化书写的需要，同时营造更为美观的内部构成。这种在书体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形态特征和规律极为重要，这是在历时的过程中由众多书写者共同完成的，在其审美上具有相对的自足性。故而对这种由篆而隶的书体的师法在审美内涵的开掘上比书家自行掺篆入隶的书体创作具有先天的优势，这是鲍贤伦成功的首要保障。对于这一点为当下书坛急于创新的书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一切成功的创新行为，其最后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对书法本体的尊重。

以古隶为基本师法对象的创作的优势何在？首先是结字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这一点对于汉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与汉简相比较也具有独特的优势。从美学的角度讲古隶到汉隶的字形演变是对字形造型能力的削弱，而草书从草隶中脱胎而出也是为了争取表现的自由，致使草书最终脱离实用而成为纯粹欣赏性的书体。从这个角度来说，鲍贤伦由汉隶上溯至秦隶在字形上获得了较强的表现自由。古隶继承了大篆在结体上的开放性，在结字上笔画可以向四周不同方向伸展、辐射，营造、占据单位文字在平面上的视觉空间，结字的开放性和自由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开放性在汉隶、楷书中是没有的，甚至连行书都不具备这种内在的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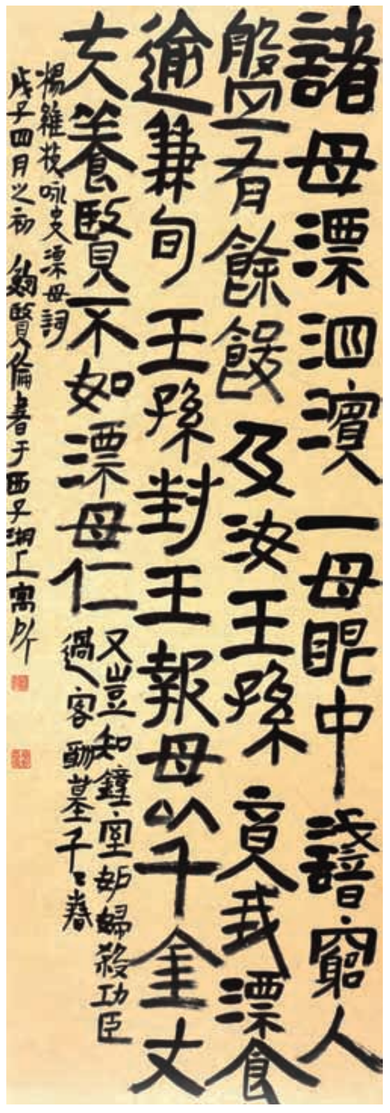
以古隶为基本师法对象创作的第二个独特优势即笔画形态的多变性。当然这种多变性以不违背线条在整体上呈现为圆厚、质朴的书体特征为度的。古隶是一种以静态为主体形态的书体，以静中见动为特征。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长短、粗细、方圆以及曲折的形态自由。古隶在笔画上的可变性为其抒情性提供了保障。

鲍贤伦的隶书创作正是利用和发挥了以上所述的两大优势。出土的秦隶简牍虽然有两千七百多枚（件），除去残破的，在已经发表的较为清晰的简牍中再除去同形重复字，剩下可以师法的单字也是极为有限的。而出土原件文字的字形很小，要将其放大，创作成为纸面上的大作品必须经过进一步转换，在字法、笔法和章法上须进行再创造。因此，对于这种具有开掘优势书体的师法和创造性发展并非易事，这也是很少人能够涉入其中的客观原因。这种开拓是一种冒险，需要胆量、勇气、毅力和智慧。经过十多年来的探索和实践，鲍贤伦终于把握了这种独特书体的创作规律，并且在自己的手下使之壮大、成长为一棵可以承载更多文化、审美内涵的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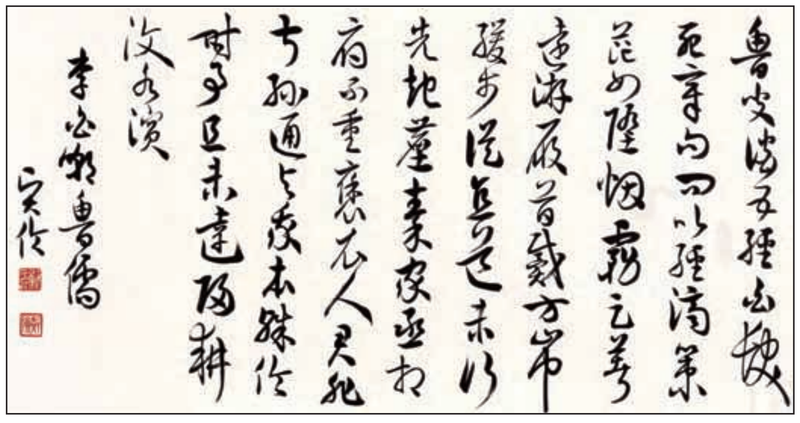
刘照载《书概》：“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鲍贤伦的书法创作极为从容自在，本于其对书法本体的根本把握，更是自我人格修养的自然流露。其作品所展现的宽博、沉厚、平和、宁静之气一如其人。其书作形象明朗而不凸显形式，变化生动而不作丑怪变形，情态备足而不刻意做作，用笔直率而不简单空洞。凝望其书，“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言说是不得已的，创作本身就是全部意义之所在。“古意”不是其中的某个特征，“古意”在他的笔下现实地生成着。古隶因鲍贤伦而在两千年后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其魅力也属于他一个人，我想很难会再有如此大力的后来者吧。（本文有删节）



■ c ¤ C Z ج 067b l ¥0/5b l



■ c ¤ ع ق 067b l ¥5/b l



■ c ¤ ش ر 24b l ¥58b l